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批判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建构

欧阳向英 阿列克斯·巴特勒

[内容提要] 本文从马克思主义视角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加以分析和批判,重新归纳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机构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关系学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同时为应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新变化提供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的三个方面,即国际经济关系、国际政治关系和国际安全关系,理论上应随时代的发展而补充新内容,实践中应对现实的国际问题给予有效的解读与回答。

[关键词] 国际关系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 国际经济关系 国际政治关系 国际安全关系

作者简介: 欧阳向英(197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理论研究室主任,哲学博士(北京 100732)。阿列克斯·巴特勒(1946-, 英文名 Battler Alex, 俄文名 Бэтлер Алекс, 曾用名 Олег Арин) 原籍俄罗斯,后入加拿大籍,现旅居美国纽约。国际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史学博士,俄罗斯科学院政治学教授,俄罗斯军事学院院士。苏联时期,曾先后在苏联科学院远东所、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苏共中央社会科学研究所任职,并曾担任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海洋开发经济与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苏联解体后,先后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和莫斯科大学工作过 5 年。发表近 450 篇学术著作和评论文章(包括 27 本专著),代表作有《世界学》和《21 世纪:没有俄罗斯的世界》等。

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历来是西方理论独霸天下,以致很多人对有无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存在怀疑。自现实主义诞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日益将现实政治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并对现实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任何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的人都无法忽略其抽象性与解释力,这是自然而然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被明显忽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者更是少而又少,不能不说是个遗憾。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视角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加以分析和批判,重新归纳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有机构成,不仅对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必要的,对应对当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新变化也是重要的。

一、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初始问题是战争起因,必然包括同一体系框架内的大国关系和不同

体系框架下的对立博弈。第一次世界大战促进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兴起，目的是研究特定体系框架内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发展到二战前夕，诞生了一系列理论著作。苏联成立后，以苏联为首的第三国际活跃在国际舞台，所谓“新型国家的行为方式”成为西方关注的焦点，因此国际关系学科第一部重量级理论专著恰恰是俄罗斯问题专家爱德华·卡尔的作品并不是偶然的。二战后，苏联成为超级大国，美苏矛盾和冲突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重大课题，无论哪个流派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都暗含对苏联的解读与攻击，并无实质区别。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之完全对立，正如政治现实主义也是在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发展成为最重要的国际关系学派的。

先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前提假设。无政府状态是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理论预设，在马基雅维利、贝特兰·拉塞尔(Bertrand Russell)、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²和汉斯·摩根索的著作中都有体现。此观点最有力的支持者约翰·米尔斯海默曾下断言，“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耶尔·弗格森在某种意义上吸收了肯尼思·沃尔兹的观点，提出(世界意义上的)政权缺失是战争的主要原因，因为没人去消除战争。³在调和无政府状态与国际合作的矛盾时，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Friedrich Kratochwil)⁴给出的解释是，各国领导人在各种峰会上经常见面，讨论并解决世界关系的许多问题，使国际合作得以维持；还有的学者用“规则”来解释，即一切社会行为取决于规则，甚至在无政府状态下，规则仍是行动的自然前提。显然，这一流派将国际社会视为无人看管的森林，而各国遵守丛林法则是行动的前提。我们认为，数千年来所谓“规则”并不能消除不计数的战争与冲突，所以“规则”并不是和平的真正原因；国际社会也并非处于无政府状态，而是经济关系上按供需规律、政治和地缘战略关系上按力的规律运行。所谓力，主要是军事实力和国家安全能力；所谓规律，就是强者总是要征服弱者，而弱者不会贸然攻击强者。战争与和平都不是无政府状态的结果，而是力的作用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⁵也就是说，表面看起来是不自觉的力量在起作用(类似于现实主义者认为的“无政府状态”)，实际是无数具有单个意志的力交错起作用的结果，最终形成了某种历史事件。所以，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并非取决于某种议事机制的建立与健全，即便真的有世界政府，也无法建设一个无冲突的世界，联合国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理想与现实是国际政治学科中的一组重要概念。以爱德华·卡尔为例，他继承了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对乌托邦主义构成打击。卡尔提出三论断：(1)历史发展的原因和结果通过

¹ 举例来说，卡特任总统时期，对苏联和中国展开人权攻势，这主要基于自由主义观点。里根时期对外政策上表现出来的反苏反共倾向，某种程度上基于政治现实主义，尤其受罗伯特·斯特劳斯-休普(Robert Strausz-Hupé)、威廉·金特纳(William Roscoe Kintner)和托马斯·波索尼(Stefan Thomas Possony)的影响。尽管这两个学派非常不同，但目的是相同的，就是摧毁苏联。在这一点上，西方国际关系各流派并无实质差别，只是实现的路径不同。英国理论家史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也认为，各流派之间，无论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还是传统主义和行为主义，其争论都非实质性的，而是细枝末节。参见 Алекс Бэттлер. *Мирология. Прогресс и сила в миров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Том II. Борьба всех против всех*, Москва: ИТРК, 2015, с.22.

² 贝特兰·拉塞尔为英国新现实主义和新实证主义奠基人之一，著名哲学家、数学家和社会活动家，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雷茵霍尔德·尼布尔为德裔美国新教领袖，曾任纽约神学院副院长。

³ Michael Sullivan.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ransition vs. persistence*,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10.

⁴ 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曾任德国慕尼黑大学教授，移居美国后重返欧洲，现任欧洲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建构主义代表之一。

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8—479页。

理性可分析可理解，而不是通过乌托邦主义者的想象来完成；（2）不是理论创造实践，而是实践创造理论；（3）不是政治是伦理的功能，而是伦理是政治的功能。也就是说，道德是力量的产物。统治阶级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总是希望社会内部和谐稳定，反对可能威胁到它的阶级斗争。同理，国际和平也体现着占统治地位的强国的特定利益。如果没有一个国家强大到足以统治世界，族群（如英、美、法国）利益就会优先，也就是所谓“集体安全”。所以，当“集体安全”意味着强国统治的时候，其背后隐藏的贪婪目的昭然若揭。强者的权利和道德与弱者的权利和道德截然不同，以致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只应去追求力量，而非其他的什么东西。卡尔的理论是可以自洽的，不足的是其理论与历史过程缺乏联系，这也是西方诸多国际关系学派的通病。比如，他无法解释不同的资产阶级国家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意识形态相同，也就是政治道德的预设一致，却为什么在国际关系上彼此会有冲突。从卡尔的思想中，我们既能看到尼采“强力意志”的影子，又能看到马克思实践论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更多地是作为批判对象出现的。

作为政治现实主义的奠基人，汉斯·摩根索是混乱的始作俑者。单从语义学来看，他把“概念”与“范畴”混为一谈，且不去辨析多义词的确切含义。如“power”一词，就具有三个含义：权力、力量和国家政权，通常他将这三个意思混用。此外，他还引入“force”一词，表示“物理上的强制力”和“暴力”，用“authority”表示“合法政权”，这时“power”就只表示“单纯的力”。类似的例子很多。从逻辑上看，摩根索是地理决定论的支持者，认为地理因素是一国对外政策的决定性因素，但他却不能据此对地缘战争加以正确预测，相反对预测持有极端的怀疑态度。显然，摩根索没读过恩格斯的著作，否则他一定会对恩格斯的预测能力讶异不已，因为恩格斯提前四分之一世纪预见到世界大战的不可避免，并明确指出参战各方，以及俄国革命的必然性。¹摩根索指出，国际政治如同任何其他政治一样，就是权力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最终目的如何，权力总是直接目的；政治无非就是保住权力、加强权力或展示权力。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追问，权力的目的又是什么？摩根索就语焉不详了。他回避了权力就是利用地位获得利益这一点，这使他的“权力”概念变得空洞，无法解释诸如美国对波兰的政策为什么不只是地位-配额问题，而且是对苏（俄）斗争问题，与经济利益和领土扩张密切相关。此外，他混淆了手段和目的。当他说经济政策本身必须与作为政治工具的经济政策区分开时，他强调的是后者具有左右其他国家政策的属性，因此瑞士对美国的出口政策就是纯粹的经济政策，而苏联对东欧的经济政策就是作为政治工具的经济政策。这看似有理，实际上并没有搞清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也没有弄清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我们认为，当各种经济的、金融的和文化的手段统统指向一个目的时，或者一个工具，如意识形态或宣传工具，服务于许多目的，而这许多目的又集聚成某一主体的对外战略目的时，那就是政治目的。对外政策的目的与手段是互为可逆的，这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谈到大国关系，肯尼思·沃尔兹有许多创见，比如他认为美苏竞争的根源在于国际关系的双极结构，然而他的问题在于，首先他对“对外政策”、“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没有很好地区分，尽管他解释了对外政策与国际环境的互动关系，但对外政策这个环节处于政治体系的何种结构当中，他没有说清楚。其次，沃尔兹意识到“结构”与“无政府主义”有矛盾，因为结构是组织性概念，与国家共存，而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组织结构，但他以微观经济中的经济主体和市场的关系来解决这对矛盾，就使矛盾更加无解。“国际政治体系，如同经济市场一样，形成于以自我为中心的行为体的相互作用之中。国际结构由各自时代基本的政治行为体确定，例如城邦、帝国或民族。结构与国家共存。”²既然国际关系由各个国家构建，如同市场由各个私人公司组成，市场的规律（按照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法则调整供需）就类似国际体系的规律，那么这就不完全是无政府主义了。况且，任何国家为了军事或

¹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00-401页。

²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91.

政治目的，都会采取一定的经济手段，以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从终极意义上说，无论哪个领域发生的国家行为，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经济利益。沃尔兹说，国家外交政策的首要动机就是生存，可以有多重动机，但生存是前提性的。考虑到不是所有的国家都面临威胁，这时维护生存就失去了意义，所以沃尔兹所说的生存前提只存在于某些经常处于险境的国家，生存也未必是所有国家对外政策的首要动机。最后，势力均衡是沃尔兹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但均势能否保障安全，在沃尔兹的论述中有自相矛盾之处。由于沃尔兹坚持认为无政府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占据统治地位，那么均势靠什么来调节各方关系，又是谁充当调节的主体？如果由关系参与者各方进行调节，那么这与沃尔兹对均势法则的规定又相悖，因为他提出均势法则自发地起作用，不以参与者的意志为转移。而且，如果均势是安全的保障，那么各方应尽力维持均势，而不是使自己的力量最大化，但我们知道，这与国际关系的实际状况并不相符。

在所有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批判理论是与马克思的理论最接近的。批判理论的兴起主要归功于罗伯特·考克斯，他是近 20 年被引率最高的 25 名国际关系学者之一，其著作《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也是国际关系学的名著之一。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有不可化解的渊源，但其直接来源并非马克思，而是哈贝马斯。考克斯与马克思的共同之处在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但他反对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与其说考克斯受马克思或法兰克福学派影响，不如说受他在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期间工作经历的影响更大。正是这段经历，使他开始思考工人阶级的处境，以及改变国际资本统治地位的行动。考克斯的理论有几大特点。首先，批判理论致力于研究世界整体，而不是某一部分，特别关注世界主导秩序，以及秩序的产生。其次，考克斯的理论明显贯穿着历史主义，而这个历史不是过去事件的简单记录，而是不间断的变化过程。他用历史唯物主义去修正新现实主义，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他将辩证法分为逻辑层面和现实历史层面，认为在逻辑层面辩证法就是通过分析矛盾而寻求真理的对话，在现实历史层面则是作为反对一方的社会力量自身发展的可能性。二是他指出批判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在对待冲突上有根本不同，新现实主义认为冲突是常态结构的再生产，而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冲突是可能使结构发生变化的原因。三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而新现实主义对此缺乏关注。四是历史唯物主义既研究生产力，也研究国家和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力量，而新现实主义忽略了对生产力的研究。在对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做出区分后，考克斯提出了自己的“历史结构”，即物质能力——组织——思想观念，其中物质能力和组织（制度）作为基础，而思想观念是更上层的东西，三个维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同时，他也为国家与国际秩序做了一个模型，即国家形式——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其中国家形式和世界秩序是基础，而社会力量（与国家的国际化、生产的国际化和统治阶级有关）处于上层，三个维度也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考克斯提出的国际秩序模型是以新现实主义为批驳对象的，他认为后者完全忽视国家形式和社会力量，只把重心放在世界秩序和力量均衡上，难以说明谁在国际舞台占上风，对诸如美国（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西方）如何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缺乏解释力。考克斯对帝国主义的批判非常深刻。他指出，近年来美国已用“开放市场”和“武装进攻”来代替了“民主”和“自由”，导致“硬实力”和“软实力”不再像以往那样相互补充，而是各行其是乃至分道扬镳。只要美元作为国际基础货币的地位不改变，美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控制不改变，对以世界银行和世贸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经济体系不改变，美元的任何贬值都可以在缩减美国债务的同时扩大出口竞争力，这就意味着美国作为帝国主义的本质不会改变。由于帝国主义行径是激发别国（也包括组织和个人）愤怒的主要原因，所以它也是恐怖主义的源头。

苏联解体后，结构主义兴起，说明两极世界终结后需要新理论对世界秩序加以重构。在结构主义者看来，国际制度有两个功能：其一是调节功能，制定各国行为标准；其二是确立规范，使国际行为可评价。调节功能是国际制度的主要功能，因为一国可以独立制订自己的

战略规划和目的，但如何实现这一目的，则与他国有关，一国必须在“国际社会”中来考虑自己与他国的关系。评价功能往往通过国际法、外交和主权等进行。作为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昆士兰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罗尔斯-斯密特反对一切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认为它们过度看重物质力量，却对规范人们行为的伦理性力量一无所知。他指出，首先，结构决定着社会角色和政治角色的行为，无论它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规范的、观念的或想象的结构与物质结构同等重要，思想、信仰和价值也具有结构的特征，并对社会和政治行为有巨大影响。其次，结构使人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为之付出行动。最后，结构与人相互塑造，通过人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来完成。结构主义者也分为现代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他们都采用分析的视角，但运用的概念是不固定的，哪怕最关键的概念，如思想、规范、文化和社会本质等，都在时刻变化。由此可见，结构主义者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缺乏足够了解，对结构的客观性和稳定性也并不看重，走向解构主义并瓦解自身几乎是必然的。

世界体系理论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它的创始人沃勒斯坦把世界体系定义为具有广泛劳动分工的实体，这一实体中既包括功能分工，也包括地理分工。沃勒斯坦认为，支配世界体系的是霸权，而霸权指在工业、农业和金融业都具有巨大优势竞争力的大国。在沃勒斯坦看来，当代世界体系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在世界体系“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动态结构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居于中心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各阶层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处于霸权地位的国家，其地位也会遇到挑战。世界体系各阶层竞争中的优势，主要取决于其生产效益。所谓霸权，包括的不仅仅是中心地位，还可以解释为一种优势。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体系进行判断有四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从浩瀚的宇宙到最小的物理现象，当然也包括历史社会体系在内的所有体系都有生命；第二个前提是对作为历史社会体系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运转方式的最重要特征的描述，即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家实现其目标的根本驱动力是无止境的资本积累，而不管这种积累发生在哪里和以何种方式得以实现，由于积累需要占有剩余价值，资本家积累的动力加速了阶级斗争的爆发；第三个前提是对现代世界体系在 1945 年至 2010 年间所发生的事情的解读，细分为两个时期：1945 年至 1970 年左右是世界经济的强势扩张期，甚至是迄今为止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历史上最具扩张性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A 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资本家把他们的重点从生产领域转移到金融领域，世界体系随之陷入了现代世界体系历史上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投机泡沫以及最大水平的多重债务之中，1970 年左右至 2010 年当垄断遭到破坏时，世界体系自身也就进入了康德拉季耶夫 B 阶段的衰退期，并可能一直持续到 2050 年左右，美国霸权在这一时期也面临加速衰落；第四个前提是对当前世界体系在结构性危机中所发生事情的描述，即包括世界经济、国家间体系、文化一意识形态潮流、生活资源的可获得性、气候条件和流行病所呈现出的混乱，贸易保护主义和极端主义借此抬头，世界范围内出现“达沃斯精神”（希望有一个“非资本主义”的体系，但仍保留等级制、剥削和两极分化等现有体系的基本特征）和“阿雷格里港精神”（希望有一个迄今为止从未存在过的体系，一个相对民主和相对平等的体系）的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原因使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处于结构性危机当中：一是美国霸权的衰落，这是一种并发性现象，或者说周期性现象；二是出现了全球范围的生产利润紧缩，这是一种结构性现象，或者说长期现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世界性的，因此资本主义的灭亡必然也是世界性的，它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极限就是其灭亡的时间。在世界体系中，经济落后的国家要改变其外围国家的地位，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不发达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寻求生存发展的一种反应。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世界体系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新的世界体系中才能得到全面实现。由于沃勒斯坦的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马克思生产全球化的理论，所以被西方称为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理论或八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方面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国际关系的论述与西方学者迥然不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起点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起点是资本主义登上舞台,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史;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国家行为体,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是阶级,从阶级斗争的视角来分析国际战争与和平等现象;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注重现实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强调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基于整体主义视角,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应包含国际经济关系、国际政治关系和国际安全关系三个方面。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整体。

一是国际经济关系。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特别是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和国际合作的发展,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经济问题日趋政治化,政治问题也包含着经济动因,国际经济关系成为国际关系的基础。国际分工与依附是国际经济关系的核心概念,世界经济一体化是世界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靠资本输出掠夺全世界是帝国主义时期国际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志。

国际分工与依附是国际经济关系的核心概念。作为国际经济关系的逻辑起点,国际分工是国际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它不仅反映国际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联系,其本身又是各国生产者之间的一种社会协作关系,具有自然和社会两重属性。从历史角度看,国际分工的出现和发展始终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剥削和掠夺联系在一起,既具有进步性,也具有局限性。一方面,它促进了生产国际化和分工专业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强有力杠杆;另一方面,它作为帝国主义剥削和掠夺的手段,又阻碍国际生产力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健康发展。在以资本为主导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决定着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所处的不同地位,也决定着劳动者的地位。由于国际劳动分工是大工业的产物,而最早的工业革命又发生在欧洲国家,这就自然形成了先进工业国、后进工业国和落后农业国的差别,从而形成以少数先进工业国为中心,以广大农业国为外围的分工格局和外围依附中心的发展进程。同时,这种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也并不是说对落后国家完全没有好处,它可以使落后或较贫穷的国家获得比本国生产更便宜的技术和产品,可以节约本国劳动,因而也存在着对本国经济发展有利的一面。从长期来看,发展的不平衡不仅导致霸权国或中心国地位的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国家地位的变动过程中,会引起工人阶级的革命,从而为社会主义国际分工准备物质前提。尽管如此,与私有制紧密联系的资本主义国际分工的强制性和被迫性,仍然是人类向理想社会迈进的桎梏。国际分工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动因,而且是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

世界经济一体化是世界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使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民族的局限性和片面性都被打破,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以至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¹列宁结合资本主义新的发展实践,提出了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国际化和世界性的发展进程,与国际垄断资本的对外扩张进程是一致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之后,整个世界正在融合为一个有机的经济机体,“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个最高阶段。社会的生产力和资本的规模业已超出单个民族国家的狭隘范围。这一切促使大国竭力去奴役其他民族,去抢夺殖民地作为原料来源和资本输出场所。整个世界正在融合为一个单一的经济机体,整个世界已被少数大国瓜分完毕。”²列宁还分析了由资本主义劳动世界性所形成的世界体系中的矛盾,认为资本主义劳动世界性发展中的矛盾主要是国际垄断同盟瓜分世界所造成的,这些矛盾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得到解决。帝国主义时代由于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性发展,必然带来劳动者争取解放斗争的世界性的联合,使社会主义革命条件逐步成熟。

靠资本输出掠夺全世界是帝国主义时期国际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志。少数金融寡头

¹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1页。

²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4页。

不仅统治了各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并且不断向外扩张，在与其他国家的金融资本争夺和勾结中，形成国际金融寡头，力图统治整个世界经济。资本输出替代商品输出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扩张的主要手段和途径。金融资本成为一种存在于一切经济关系和一切国际关系中的巨大力量，甚至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它能够支配而且实际上已经支配着一些政治上完全独立的国家，同时还要从国外市场上，从全世界把竞争者排除掉，主要手段就是使竞争者在金融上处于依附地位。¹强国不仅在瓜分领土、瓜分殖民地这种直接意义上瓜分了整个地球，而且通过大银行和大资本家在经济上也重新瓜分了全球。它一方面加强了对殖民地的剥削和掠夺，加剧了殖民地人民与宗主国的矛盾；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并进一步把殖民地拖入世界市场。这一切又会推动殖民地无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从而为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创造条件。

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统一世界经济体系的趋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不会被消灭，反而会得到发展和完善。“建立统一的整个的全世界经济体系的趋向，这种趋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充分显然地表现出来。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则是无条件地会继续发展和臻於完善的。”²如果想用社会主义世界联邦来对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那么当社会主义的力量还不足够强大时，把“世界联邦”当作一个独立的口号未必是正确的。为了实现迅速发展生产力这一目标，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即通过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先进技术装备和管理经验等，来加速自己的发展。对外开放，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经济联系，不仅是克服经济落后的需要，也是建立和平共处关系的需要。

二是国际政治关系。世界民主与霸权主义的冲突是国际政治关系的核心问题。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民主和霸权尚未成为世界性的问题。世界民主和霸权主义理论的出现，是国际政治长期演变的结果。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主日益明显地被某些西方强国利用，成为其在世界范围推行霸权、实现战略扩张的借口，与民主的实质完全相悖。民主原则扩展到国际范围后，理应遵循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在国际事务上拥有同等的话语权，但到目前为止，国际组织和各种国际论坛中充斥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秩序仍占主导地位。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日渐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毒瘤，东西方、强弱国、不同制度国家间存在着严重的经济利益和文化冲突，世界民主成为空谈。

霸权和民主理论的国际化发展恰好印证了马克思关于自由、平等、人权、民主都是历史概念的观点。有国家存在，就会有政治上的集权和工商业上的霸权，扩展到世界范围，就是为实现更大的经济利益和巩固此经济利益所必不可少的政治权力而追求的世界霸权。经济原因是霸权主义的基础，同时霸权主义与政治制度密切关联。从历史上看，争夺霸权的野心往往以非经济驱动的面目出现，比如俄国就曾打着泛斯拉夫主义的旗帜来实施争夺世界霸权的计划，其目的就是要侵占君士坦丁堡。“沙皇怎样去‘解放’呢？请问乌克兰的农民，叶卡特林娜起先也曾把他们从‘波兰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过（借口是宗教），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后来吞并他们。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的全部欺骗实质上是什么呢？就是要侵占君士坦丁堡——仅此而已。只有实行这种侵占才能有力地影响俄国农民的宗教传统，鼓动他们去保卫神圣的沙皇格勒，延长沙皇制度的寿命。只要俄国人一占领君士坦丁堡，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独立和自由就完了：这些兄弟们(Lratanki)很快会感觉到，过去甚至在土耳其人统治下他们还要好过得多。这些兄弟们完全是因为幼稚透顶，才相信沙皇关心的是他们的利益，而不是他本身的利益。”³现在看来，美国在世界各地灌输的人权信条与俄国当年鼓吹泛斯拉夫主义是何其相似！一旦军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占上风，就不排除发动战争这样一种可能，甚至通过

¹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页。

² 《列宁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92页。

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273页。

战争来扩大市场也被资产阶级视为天经地义，这一点早已被恩格斯洞穿。¹

在帝国主义时代，规模巨大的垄断资本组成了国际同盟，最富裕的国家把全世界的领土瓜分完毕，国际托拉斯开始从经济上瓜分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争夺银行资本的市场和扼杀各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资本家垄断同盟对世界的争夺，体现在国际政治关系上，就是帝国主义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这是帝国主义的重要特点。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转向反动是必然的。“这种新的经济即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就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政治上层建筑，就是从民主转向政治反动。民主适应于自由竞争。政治反动适应于垄断。²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内容，而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它作为大垄断资本家集团政治的继续，具有同样有着残暴性和残酷性，是最反动的战争。这种帝国主义战争，不再具有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解放的意义。

两个平行市场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是斯大林关于国际问题的重要论述。他认为，两个平行市场的形成，不仅使资本主义总危机加深，而且使资本主义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加剧。“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就是由这种危机产生的。在战争时期互相撕打的两个资本主义同盟，其中每一个都指望粉碎敌方，而获得世界霸权，它们都想从这里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美国指望击溃自己最危险的竞争者德国和日本，夺取国外市场、世界的原料资源，并取得世界霸权。”³资本主义总危机是包括经济、政治在内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全面危机，基础是世界社会主义实力的强大。要消灭危机，就要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在被资本主义包围中生存和发展，资本主义不仅要利用一切办法遏制社会主义，破坏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实力，而且总在等待时机进攻社会主义，颠覆社会主义。世界民主不可能不经过斗争就顺利到来，更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同时，斯大林也强调，虽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制度，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是无法避免的，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又是客观存在着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斗争的本质，是谁战胜谁的问题，但在谁也消灭不了谁的时候，只能在斗争中求得并存。

三是国际安全关系。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最敏感、最复杂，也最具有全局性的重要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正处于自由发展和繁荣时期，但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的殖民掠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殖民地和市场而进行的战争，以及各国人民反封建压迫与资本主义剥削的战争，构成了国际安全关系的重要特征。

战争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才出现的社会现象。战争的具体原因可能千差万别，但历史上的一切战争，包括宗教战争，共同原因都是掠夺财富和夺取维护这种财富的权力，归根结底也就是阶级冲突和斗争。阶级对立是国家或民族间爆发战争的根本原因，而经济目标几乎是发动战争的唯一驱动因素。没有私有制、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没有维持这种剥削和压迫的国家这一工具，也就不会产生战争。而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消灭。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资本主义时期各种战争的具体原因进行了大致分类：一是争夺地区霸权，如英国发动的海外侵略战争，正是为了实现它成为世界帝国的野心；二是边界争端和领土扩张，如沙皇俄国对外战争的主要目的就是领土扩张，其疆域边界也因一次次的领土兼并而不断更改；三是国内革命引发危机，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1848年欧洲革命所引起的一系列动荡；四是统治者转移国内矛盾，如19世纪末的俄国为取得借款所发动的战争，目的在于“进行垂死挣扎”；五是抢夺世界市场，为了这个目标，资产阶级不惜动用国家全部生产能力，从而加剧国内危机。依据其阶级内容，

¹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5页。

² 《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3页。

³ 《斯大林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1-562页。

战争可以划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在于战争性质，虽然人与武器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也很重要。

战争不仅体现着国际安全关系，也会对国际经济关系产生影响。战争对人类历史发展具有双重作用。它无情摧毁人类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社会灾难，有很大的破坏作用，同时它起着非常重要的革命的作用，催生着每一个新社会的诞生，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在阶级社会，战争与和平的关系是矛盾统一体：两者既相对立，又相联系，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相互转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主张反对战争，维护和平。首先，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是实现和平的唯一途径。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达到消灭私有制，从而消灭阶级，是最终消灭战争、实现永久和平的唯一正确途径。实现永久和平的基本条件，就是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也就是说，只有在劳动者得到彻底解放，除了共同劳动不存在任何统治者的时候，永久和平才能彻底实现。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表达了对资产阶级战争的反对态度。再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根绝一切战争。最后，在资本主义列强争夺欧洲霸权、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迫近的情况下，捍卫和平并非没有可能，其途径就是裁军，从而保障和平。时至今日，马恩对国际安全关系的阐述对我们处理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仍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时代战争的根源就是帝国主义，战争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帝国主义列强争霸世界斗争的必然结果，体现着帝国主义的本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是探讨战争性质的基本出发点。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民族解放战争是民族解放政策的继续，无产阶级被迫进行的革命战争是无产阶级政策的继续。任何战争都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分不开。要改变战争的性质，只有变换掌权的阶级。无产阶级必须拿起武器反对资产阶级战争，但使用暴力并不是无产阶级的理想和唯一选择。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是多样化的，至于采取民主的形式还是暴力的形式，需要由各国无产阶级依据本国的具体状况和形势而决定。斯大林对战争与和平理论有进一步的发展。他认为，帝国主义时代战争的根源在于列强争夺和瓜分世界的斗争，这是由它们之间发展不平衡引起的。在发展极不平衡的条件下，争夺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市场的斗争已经使周期性的重分世界和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换言之，帝国主义阵营内的冲突已经不能用和平方式解决，必须诉诸战争。独占势力范围必然引起战争，而战争又是恢复均势的惟一手段。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然而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和平的外交政策延缓和推迟战争的爆发。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和平，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是实现和平的手段，制止战争是和平发展的基本条件，维护和平必须有强大的国防，必须建立有效的国际管制机构等等。

三、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是后者的现实化和本土化，其生命力取决于解释力和创新性，取决于能否对现实的国际问题予以有效的分析与研判。当今世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面对激烈的大国博弈和各种思潮涌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至少应对以下三个问题给予回答。

（一）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

在刚刚结束的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会上，习近平主席就全球化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以及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应承担的时代责任等问题发表了精彩演讲，对当今世界出现的“反全球化”浪潮作出了鲜明回应。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国与世界的经济交往日益密切，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已成为自由经济与开放经济的一面旗帜。然而，我们也应看到，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部分阶层提出“反全球化”的诉求，他们认为全球化加剧了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也使国内收入分化和失业更加严重。客观地讲，全球化具有正反两方面效应，重要的是如何放大它的正面效应同时减少负面效应，这取决于各国政府的判

断以及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取决于全球治理能力的加强和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推动。如果“逆全球化”成为一种时代背景,中国该如何处理与世界的经济关系,或许历史经验有助于我们思考这一问题,因为任何现实问题都不是孤立的。即便全球化不会出现逆转,中国也应该认真思考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与定位,以高超的定力来应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活动中,逐步形成的一个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原则。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政治上坚持独立自主、经济上依靠自力更生,某种程度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封锁政策。毛泽东并非不重视对外贸易,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努力创造条件开展对外贸易,包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但反对带有附加条件的贸易,反对不加管制的进口。“我们这类国家,如中国和苏联,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不是国外市场。这并不是说不要国外联系,不做生意。不,需要联系,需要做生意,不要孤立。”¹在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商业关系方面,不论意识形态有多大差异,都可以进行自由平等的贸易。对内节制资本和对外统制贸易,是新中国在经济斗争中的两个基本政策。对外贸易必须严格统制,不但奢侈品、非必需品不许进口,就是日用必需品必要时也不许进口,而由自己生产。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加以吸收。

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由捍卫主权逐渐过渡到积极建立对外经济联系,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对外开放具有深远的政治影响,因为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而要摆脱贫困,在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实际,不能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邓小平多次阐述中国对外开放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闭关自守只能让中国变得落后。“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这种帮助不是单方面的。中国取得了国际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中国对国际的经济也会做出较多的贡献。”²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要有利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利益,缩小南北经济差距,使南方国家摆脱贫穷和落后状态,因为世界的发展决不能长期建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同西方国家加强交往和合作,是一个战略问题³,同时要警惕一些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搞和平演变。邓小平的这些深入分析和论述对于中国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坚持正确思想路线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进入到新阶段。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银行等等顶层设计前所未有,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对我们的经济管理能力和外交水平提出了新挑战。中国提出创新驱动、协同联动、与时俱进、公平包容,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和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以此解决世界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和分配不均的难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国际化、一体化和全球化是国际经济关系中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三个层次。世界经济从未真正实现过一体化,包括欧盟在内,全球化目前也困难重重。世界范围内金融霸权主义仍然存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而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居于不利地位,本来就非中性的国际制度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推动下继续向既得利益者倾斜,在此情况下,中国要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经济战略目标。中国要融入经济全球化,但全球化只是中国获得必要的资金和技术的一种手段,并非目的,不应为全球化而全球化。特朗普上台和欧洲民粹主义风行,决定

¹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

²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

³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

了西方对中国的打压政策不会停止，大国博弈会更加激烈，议价机制会更加复杂。中国有必要重温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理念，首先立足国内，解决好国内问题，然后才是以适当的规模和速度进行对外经济关系的深化与拓展。

（二）中国与世界的政治交往

作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代表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而作为现存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制度上的差异。中国与世界的政治交往有和谐，也有斗争，维持同一性的关键就在于坚持国际民主原则。

国际民主的核心是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民主对于所有国家都是必须的，而且应当是全面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党务上以及国际关系上，都需要民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¹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应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实行和平竞赛。从现实情况看，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其基础就是国际民主原则，但国际民主不是坐等来的。毛泽东告诫我们，中国在国际上要获得真正的平等地位，必须靠自己的努力，首先通过革命使人民获得自由和民主，使生产力获得解放。毛泽东先后提出两个中间地带和三个世界的思想²，指出虽然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各发展中国家之间也都有矛盾，但世界的最主要的矛盾是第一世界同第二、三世界的矛盾。三个世界的划分，不仅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杰出贡献，而且是社会主义国家参与国际斗争的有效战略。长期以来，中国外交都以第三世界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为基石，团结多数推动国际政治秩序的合理变革。

邓小平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指出战后国际政治形势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第三世界的兴起及其国际分量的大大增加，需要重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世界上那么多伊斯兰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实行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人口也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还有非洲，非洲统一组织的强烈的普遍的呼声就是要求别国不要干涉他们的内政。这是世界局势的一个大背景。”观察近期发生的中东动乱和欧洲难民危机，我们不得不惊叹邓小平的高度预见性，重申国际民主对国际政治实践的特殊意义。“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这些原则的创造者是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³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但永远不当头，永远不做超级大国。中国不输出革命，也不允许外国干涉我们的内政。中国观察国家关系不看社会制度，而是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既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不计较历史恩怨，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些原则都是解决国际政治问题的法宝。

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中国对外政治关系既体现了连续性，也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如从扶持第三世界兄弟党搞革命建设到不以意识形态划分远近亲疏，从与某一大国结盟反对另一大国到发展等距离外交关系，从着力提高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话语权到决不当头，中国外交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渐淡化。这一调整的好处是回避了两种制度的矛盾，但也使

¹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170页。

²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和日本是第二个中间地带；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中国是第三世界。

³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

得中国外交缺乏鲜明的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外交要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实际就是要对中国与世界的政治关系做出适当调整。完全以意识形态取舍不行，因为意识形态相同而国家利益不一致一样会有冲突；完全以利相交也不行，因为“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只靠利益往来难以交下真朋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中国外交义利结合的范例，既互利互惠，又同声共气，彼此形成了良好的战略支撑。如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国处理与世界政治关系的重中之重。

（三）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中的角色

当今世界，和平是总的国际背景，但局部战争和地区武装冲突不断，为世界和平蒙上一层阴影。台湾仍未回归，半岛核云笼罩，日本煽风点火，越南反复无常，南海局势吃紧，都使中国周边局势更为复杂。中国建设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毛泽东不仅为中国制定了和平的外交政策，而且向全世界宣布中国要为世界和平承担自己应有的责任。他指出，世界和平不可分割，这是当今世界政治的特点。¹因此，制止战争维护和平的斗争也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要联合起来，保卫世界和平。中国要和平，但并非不支持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战争，因此中国对古巴、阿尔及利亚、越南南方人民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都给予了支持。世界大战的危险确实存在，但却是能够被制止的。以社会主义国家为核心的民主力量的迅速发展，使帝国主义者不敢轻易发动世界大战，如果这种民主力量能继续发展 10-15 年，就可能制止战争。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和平共处。

邓小平在分析新形势下战争与和平问题时指出，战争危险仍然存在，霸权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但同时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第三世界的力量是当代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和平的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以及美国和苏联人民。²“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中国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时候，就强调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并认为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因为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别人没有资格，中国没有资格，日本没有资格，欧洲也没有资格。所以，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³总之，对世界和平局势的判断是，只要美苏（俄）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不过，大战固然可以推迟，但是一些偶然的、局部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预料的。我们应当抢时间，扎扎实实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特别是能指挥现代战争人才的准备。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提高干部指挥现代战争的能力。

苏东剧变后，世界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国际局势总体走向缓和，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加强。超级大国操纵国际事务的局面已经有了很大改变，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但是世界各种矛盾也在深入发展，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民族矛盾、领土争端和宗教纷争日益突出，甚至酿成流血冲突和局部战争。营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实现有效裁军和军备控制，强化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强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公认的国际准则，成为防止冲突和战争的可靠前提。习总书记的新国家安全观强调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倡导求同存异，而不是你死我活。只有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才能实现世界和平和中国的长治久安。在国际安全问题上，中国将积极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同世界各国共同维护人类良知和国际公理，在世界和地区事务中主持公道、

¹参见《毛泽东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33 页。

²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27 页。

³《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04 页。

伸张正义，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热点问题的解决，通过平等协商处理矛盾和分歧，以最大的诚意和耐心，坚持对话解决分歧。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正在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更多公共产品。

参考文献：

- [1] Алекс Бэттлер. *Мирология. Прогресс и сила в миров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Том II. Борьба всех против всех*, Москва:ИТРК, 2015.
- [2]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华社 2013 年 11 月 15 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1/15/c_118164235.htm，登录日期 2017 年 1 月 8 日。
- [3] 李滨：《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7 期。
- [4] 李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 5 期。
- [5] 李慎明主编：《马克思主义国际问题基本原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年。
- [6] 欧阳向英、刘国平、李燕：《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基础理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

联系方式:

欧阳向英:13910111170, oyxymail@126.com

ALEX BATTLER: olegarin@me.com